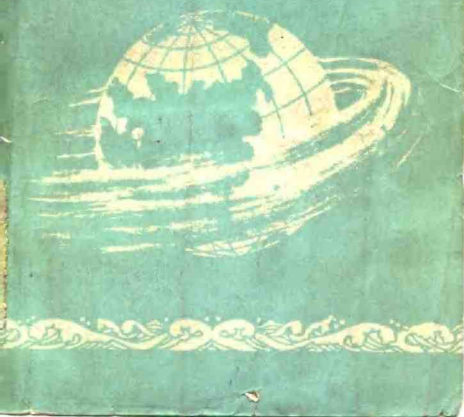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论丛

一九八〇年第一辑

世界史学术讨论会文集



目 录

前言	傅于麟 (1)
谈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服务	齐世荣 (5)
浅谈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罗荣渠 (24)
关于奴隶社会的经济结构问题	胡宗达 (37)
关于东南亚资本主义萌芽和明朝海盗、海禁等问题	韩振华 (57)
从几个问题看古代世界史的统一性和向整体性的发展	陈隆波 (61)
东西方封建社会的一些特点	尹元超 (81)
进入整体发展的近代世界	夏 诚 (99)
从世界全局看现代史主流的几点尝试意见	李植柄、唐希中 (118)
十六世纪尼德兰革命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郑昌发 (133)
十五、十六世纪中国私人航海贸易、海禁、 海盗商人与世界历史潮流	杨汉球 (154)
略论英帝与沙皇俄国称霸的几个特点	周友光 (175)
美国新孤立主义问题初探	卢明华 (192)
罗斯福、杜鲁门与中国	毕中杰 (223)
从蒙哥马利到伯明翰 ——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前期的美国黑人运动	刘绪贻 (253)

论西蒙·玻利瓦尔及其政治思想	萨 那 (271)
论巴西民族的形成	黄邦和 (292)
美洲国家组织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	沙丁、杨典求 (328)
论瓦加斯在发展巴西民族经济上的作用	张镇强 (350)
试论古代印度河流域文化的特点及其产生的 原因	涂厚善 (375)
日本 室町 时代的“酒屋土仓”和农民 运动 初探	童云扬 (394)
试论工联在第一国际中的活动和作用	施荫昌 (412)
试论苏维埃俄国新经济政策初期的退却	陈慧琦 (432)
试论三十年代亚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	胡德坤 (452)
略论欧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	罗志明 (471)
张伯伦与绥靖政策	吴友法 (490)

前 言

吴于廑

世界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是我国社会科学中起步较晚、基础又较薄弱的部门。近年以来，开始出现一些有积极意义的动向，大体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第一，提出了一些理论问题，讨论范围涉及社会形态，历史动力等各个方面。这对加深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促进工作中运用这些原理，无疑都将起有益的作用。世界史的内容，极其广泛而复杂，理论分析、综合的难度较大，比之国别史、地区史，有过无不及。从这一意义上说，探讨理论问题，提高理论水平，在世界史方面，要求就更见迫切。过去，世界史方面表现出来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掌握，并不很强。对错误观点，对在国内某种政治气氛中一时流行起来的论调，往往辩识不深。在某些问题上，强以外国历史上的人物、事件，比附本国历史上的人物、事件，以一言为定则，视曲解为创新，这种情况，不是没有。为了改变这一状态，促进我国世界史这一学科的发展，提出理论问题展开讨论，又通过讨论以增强理论能力，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提出了编著世界史和世界断代史的新要求，世界上古史且已有新著出版，显示出我国学者研究的特色。这些新要求和著述，都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力图摆脱过去对由国外引进的同类著述的依赖，从指导思想、体系、具体问

题的观点和结论，以及研究方法等，试图找出一条新的、依靠自身力量探索而来的途径。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早已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构成这个整体的各部分，随着形势的变化，已大非昔比。它们在各个时代的地位、比重、彼此间的关系，应当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观点，予以新的估定。在今天，研究和编著世界史，如果仍然沿袭基本上由近代西方史学形成的概念、体系，即使在若干问题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加以改造制作，也很难跳出老窠臼，形成有时代意义的新特点。从这一点说，尽管近年提出来的某些看法，仅具有尝试的性质，有的还难免粗疏，包含谬误，但是对于开辟思路，促进新的探索，应当说，是有意义的，值得给予关心和支持的。

第三，专门研究的力量正在组织和动员起来，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等上的学术研究会不但拟订了各种专题研究计划，而且还拟订资料翻译和出版计划，为进行专门研究提供必要的条件。世界史，在历史学的诸分支中，要求作综合和典型论述的方面通常较多。但是，综合的基础不是概念，而是由专门研究确定的具体历史知识；典型不是偶然的孤例，而是由多种同类事例中抽选出来的样本。离开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等的研究成果，编著世界史就难以作出有充分依据的综合，也难以找到有代表意义的典型。因此，近几年来各种学会所进行的比较专门的学术活动，除其在各自领域中的意义而外，还为丰富和更新世界史的内容，推动世界史这门学科的发展，正在创造有利条件。面貌一新的世界史，不能凭空而来。没有新的、不断深化的专门研究，任何关于世界史的新的设想，都难免是徒托空言。

以上三方面的动向，如能密切配合，必能成为我国世界

史这门学科向前发展的新的、有利的起点。

去年，一九七九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湖北省世界历史学会、武汉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了一次世界史学术讨论会，到会的有来自全国各方面的学者、专业工作者，提出论文七十多篇。从论文的选题、内容，可以看出大体上也反映了上面所说的三方面有积极意义的动向。许多文章已先后在学报和学术杂志上分别发表。这里收入的二十多篇，主要是想把在会议上表现出来的世界史专业工作者正在努力的几个方面，以论文集的形式，比较集中地反映出来。

这个文集中的部分论文，是讨论或较多地关系到理论问题的。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党性问题，混淆已久；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理论，曾经以一种极狭隘的理解左右史学；在一种社会形态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究竟在何种条件下表现不一；……关于这类问题，本集所收的有关文章中分别有所论及，对有些问题，可能起到澄清或引致进一步讨论的作用。另一部分论文是涉及世界史各个断代内容问题的。所有文章都没有越出西方史学的传统断代框架，但它们在指导思想上具有一个总的倾向，即以世界为一全局，讨论各个断代中的世界历史统一性、各主要地区在发展上的特点、世界历史如何进入整体发展以及当前世界历史主流等问题。文章中的论点，不一定都稳妥无疵，不一定成熟，待商酌和进一步研究的地方都不会少。收入本集，主要取其能突破解放后多年来习惯于以分期汇集国别史作为世界史的做法，提出从世界全局来观察世界历史发展的尝试。在西方，以朗克史学为正宗而形成的世界历史体系，至第二次大战以后，由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变，早已失去其支配地位。汇编各国史为世界史的做法，十八世纪末的哥廷根学派就认为不足取，现

在本集所收的几篇文章，试图以世界为一整体看历史，其实也不算怎么新颖。但在我国世界史这门学科长期因袭外来著述的情况之下，能够提出这样一点想法，对于引起讨论，由粗浅而逐渐深入，使含糊的得以明确，错误的得以改正，似亦不无可取。还有一部分文章则是对若干专门问题的论述和探讨，涉及古代、十五十六世纪、近现代、亚、欧、美各洲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在这次会议上，还成立了两个专门性学会，一是美国史研究会，一是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因之在这部分文章中，也包括这两方面的文章。在会上，这两方面提出论文的篇数不少，本集分别收了其中的几篇。由于这一部分文章涉及的方面较多，不易集中到某些中心问题上来。把它们收在这里，说明在这次会议上，国别史、地区史以及其他方面的专题研究，是参与会议者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前面已经说到，要更新世界史的编著，没有各个方面的新的专题研究，是做不到的。

一九七九年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史学术讨论会，是来自全国各方面世界史专业工作者为推动本学科向前发展而作出的努力之一。这个文集的编成，是他们努力的共同成果。收入这个集子的文章，约为提交会议论文总数的三分之一。遗珠之憾，必不可免。关于美国史的论文，知己另辑成集。这对反映一九七九年我国史学工作者研究美国史的成绩和动态，不但比较集中，而且也必然是更加全面的。

一九八〇年六月，于武汉大学

谈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服务

齐 世 荣

不久以前，北京史学界的一些同志曾就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有的同志主张今后不要采用这种提法，以免产生种种流弊；但另外一些同志认为这个口号本身并无根本性的错误，仍能成立。我认为，历史学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作为一个口号，我们最好采用“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服务”之类的提法，去掉“政治”二字，以免产生一种误解，以为历史科学应当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直接的政治任务。本文不打算对口号本身做更多的讨论，仅想就这个问题的实质试作一些分析。以下谈四点意见，向同志们请教。

一块试金石——革命性与科学性的 内在的、不可分割的结合

历史学从来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例如，封建史学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目的就在于为宋王朝提供统治经验，求得长治久安的办法。资产阶级史学家中有的人不稳讳历史与政治的关系，如西利（J. R. Seeley，我们后面还要讲到他）；有的人虽然标榜“为历史而历史”，实际上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马克思主义的各门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科学在内，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精神武器，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①毛泽东同志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②以上两段话说的都是哲学，但其中讲的基本道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也是适用的。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剥削阶级的历史学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二者在都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不同的是，剥削阶级的历史家由于具有剥削阶级的偏见，往往歪曲社会的历史（不等于说都无真知灼见）；而无产阶级的历史家由于是为无产阶级这个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服务的，他们根本不需要歪曲社会的历史，而恰恰相反需要揭示历史的真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是把革命性与科学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的革命性是建筑在科学性的基础之上的。列宁讲过这样非常重要的一段话“这个理论（指马克思主义——笔者）直接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

* 本文是作者根据1979年12月在武汉召开的世界史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

何剥削。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③

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与革命性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起来，这是一块试金石。凡是在历史研究中严格遵循这个原则的人，才是真正为无产阶级服务，才能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作出贡献。反之，凡是肆意践踏这个原则的人，不论他把“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之类的口号喊得多响，如果不是“四人帮”之流的无产阶级的敌人，至少也是历史科学的破坏者。还有一种人，他们不反对上述的原则，但在研究过程中又往往把革命性与科学性割裂开来，以为科学性是从属于革命性的，为了某种“政治上的考虑”，可以有选择地对史料作些“剪裁”的工作，牺牲一下科学性也无妨。下面我想分别就这几种不同的情况，试作一些分析。

影射史学的流毒必须继续清除

在文化革命中，“立足现实，追溯历史”之类的提法曾经风靡一时。叛徒张春桥还说过：“讲历史都是讲现在，都是为解决现在的问题。”诸如此类的论调似是而非，使不少人上当受骗，流毒至今有待于进一步清除。

“立足现实，追溯历史”是影射史学对于自身的绝妙写照。所谓“立足现实”，实际上就是立足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的政治需要；所谓“追溯历史”，就是按照这

种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去歪曲、篡改历史。影射史学的文章一律是先有结论、后凑材料。材料有时有几条，但往往是被曲解的；有时是孤证；有时连孤证也没有，便干脆捏造出来。按照这种办法炮制出来的文章，当然只有反革命的政治性，而毫无科学性。正是由于毫无科学性，一当炮制者的政治地位丧失以后，它们也随即失掉存在的价值，此后只能被送往废品收购站，或起点反面教员的作用。

在外国，为了某种反动政治的需要来伪造历史的例子，也是常见的。例如，十九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史学家西利，就是一个殖民主义的狂热的辩护士。他主张历史学要与实际政治发生关系。为了替英帝国奴役印度的罪行进行辩护，他硬说一八五七年印度士兵的起义是被印度人民消极对待的。^④又如，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一些御用史学家便纷纷编造他的历史“功勋”。关于赫鲁晓夫的初期活动，一九五三年以前的资料只提到他参加过国内战争。后来却把他参加革命的时间越提越早，硬说他在一九一七年初已经是乌克兰革命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却避而不谈他入党的时间还在一年以后。苏联国内战争快结束时，赫鲁晓夫才被高加索战线第九集团军政治部任命为指导员，但苏联的某些历史著作竟把这样一个低级的政治工作人员和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伏龙芝等人并列，极大地拔高了赫鲁晓夫的历史地位。^⑤

“四人帮”已经垮台了，但是影射史学的恶劣影响仍然有待肃清。我看到有些批判影射史学的文章，虽然出自良好的动机，但使用的方法仍然是实用主义的。例如，为了“对着干”，有的文章把吕后描写为一个极坏的女人，甚至说她毒死赵王如意的结果，使汉高祖的政治路线后继无人。根据是什么呢？不过一条史料，就是刘邦曾经说过一句话：“如

意类我”。⑥“如意类我”，只是一个孤证，而且就是这个孤证也不能解释为如意是刘邦的政治路线继承人的意思，除非还能找到其他一些史料，可以证明如意的政治主张确实和刘邦一样。但这是找不到的。江青为了想当女皇，极力吹捧吕后，把吕后作为自己的化身，对此当然应当予以揭露和批判。但我们也不应反转过来把历史上的吕后按照叛徒江青的反动面目来塑造。吕后就是吕后，她既不是“文化革命旗手”的江青，也非“四人帮”之一的江青。像上面所举的例子，虽然为数极少，但其存在本身却说明了影射史学的流毒尚未肃清。我们要想使历史科学得到健康的发展，就必须进一步对影射史学展开批判。

历史研究要与现行政策的宣传有所区别

有一些作者，他们认为历史研究要加强革命性，发挥战斗作用，就必须与本国现行的各项政策紧密结合起来，按照现行政策的口径来写历史。这些作者虽然不是故意歪曲、篡改历史，但往往对史实不忠实或不够忠实，因而他们的研究成果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这种倾向，苏联史学界从二、三十年代起就已经存在，对我国也有相当的影响。

我认为，一定要把历史科学的研究与现行政策的宣传区别开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造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

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小平同志这里所讲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这个基本道理，对于历史研究工作也是适用的，或者可以说是更为适合的。历史科学由于它本身的特点，是通过总结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通过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等方面的经验教训，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它不是也不应当是某项现行政策的历史注解。具体的政策总是要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并根据实践的检验而有所补充和修正。随着时间和地点的改变，在彼时彼地是正确的东西，在此时此地可能变为不正确的东西。历史研究如果总要和现行政策去对口径，那就必然要把研究的结论变来变去，从而失去科学的价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在一项决议中批判了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错误，正确地指出：“这一学派歪曲地解释历史事实，而且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用今天的观点而不是根据产生历史事件的条件来说明历史事实，因而歪曲了历史真相。”⑦

下面我想举出一些例子，看一看把历史研究同政策宣传混同起来所造成的危害。

第一个例子，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俄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中，在二、三十年代苏联史学家的著作中，都把英帝国主义看作武装干涉苏俄的主角。这是符合历史真相的。斯大林说：“英国资本主义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人民革命的最凶恶的绞杀者。……苏联十月革命以后……英国资产阶级进攻苏联，企图建立‘十四国联盟’”。⑧斯大林此文写于一九二七年，说“英国资本主义过去、现在”是“人民革命的最凶恶的绞杀者”，当然是正确的。但说“将来”还是“人民革命的最凶恶的绞杀者”，

就未免主观臆测了。二次大战后，美帝国主义企图称霸世界，苏联也曾把反美作为对外政策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史学家便从当时的政策需要出发，把当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俄的主角说成是美国，而不再是英国，军事史家纳伊达说，美帝国主义是“〔苏俄〕外来的和内部的反革命的一切力量的主要贷款人，是协约国的一切战役和一切最主要的反苏阴谋的首倡者”。^⑨美帝国主义无疑犯了干涉苏俄的罪行，但如果把它的作用夸大为“协约国的一切战役和一切最主要的反苏阴谋的首倡者”，那就不符合历史真相了。纳伊达的著作有一定的科学性，但缺乏严格的和高反的科学性，因而它的思想性也就不能不受到削弱。

现在再看另一个例子：苏联史学界对少数民族领袖沙米尔和赫麦尔尼茨基的不同评价。

沙米尔是高加索的一个穆斯林教穆里德教派的宗教和军事领袖。从一八三四年到一八五九年，他领导了故乡人民反对沙俄兼并的斗争。在一九五〇年以前，大多数苏联历史学家都把他看作反对沙俄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战士，潘克拉托娃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苏联通史》一书中说：

“沙米尔的活动在这一时期不仅针对着沙皇制度，而且针对着地方封建领主，因此具有民主的、进步的性质。”^⑩继潘克拉托娃之后，古谢诺夫在一九四九年出版了《十九世纪阿塞拜疆社会政治思想史片断》。这本书同样肯定沙米尔的著作，受到了赞扬，并被作家协会推荐为斯大林奖金的得奖著作。

但是，由于苏联领导人和史学家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对沙米尔的评价就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真理报》刊登了一项公告，宣布斯大林

奖金委员会承认它以前推荐古谢诺夫的书为得奖著作是“错误的”并宣布它已经请求部长会议撤消把斯大林奖金授予古谢诺夫的决定。公告说，沙米尔所领导的运动“是一个反动的和民族主义的、为英国资本主义和土耳其苏丹服务的运动”。接着，当时担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巴吉罗夫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文章，^⑩指责沙米尔从一开始就勾结土耳其，为它的利益服务。巴吉罗夫认为高加索人民之并入俄罗斯，是“发展他们的经济和文化的唯一可能的道路”，使他们“获得了保障，可以免受外部敌人的侵略”，还“推动了高加索各族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斯大林逝世后，巴吉罗夫被当作贝利亚的同伙逮捕了。一九五六年一月，《历史问题》杂志召开读者会议，副主编布尔札洛夫认为苏联史学家必须纠正过去几年的伪造和夸大失实之处，其中也包括对沙米尔的评价。他把对这个问题的全部歪曲都归咎于巴吉罗夫的那篇文章。此后，又出现了一些肯定沙米尔的文章。例如皮克曼的《论高加索山民对沙皇殖民者的斗争》一文，发表在《历史问题》一九五六年第三期上。

但是不久，对沙米尔的评价又由肯定转向否定。《历史问题》在编辑部改组后，于一九五七年第三期发表了题为《在历史科学中坚持列宁的党性原则》的社论，对前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了批判，对重新评价沙米尔的问题自然也给予了谴责。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苏联史学界对沙米尔基本上是否定的。

总之，对沙米尔的评价前前后后多次反复，但最终是予以否定。苏联史学家之所以要否定沙米尔，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陷入了俄罗斯沙文主义。马克思和

恩格斯都是高度赞扬高加索山民的抗俄斗争的。马克思指出：“高加索各部族对俄国人发动了总攻势，沙米尔取得了十分光辉的胜利”。^②恩格斯也指出：“高加索的斗争是给山地居民带来最大荣誉的一次山地战”。^③

与否定沙米尔恰成对照的，是对鲍格丹·赫麦尔尼茨基的肯定。鲍格丹·赫麦尔尼茨基是十七世纪乌克兰的一个统领。一六五四年，他在彼列雅斯拉夫会议上请求莫斯科国保护，以对抗波兰。早在一九三七年，苏联政府为悬赏征求优良的中学三、四年级苏联历史教科书而特设的评定委员会就其决议中指出，对赫麦尔尼茨基反对地主的波兰和苏丹的土耳其占领乌克兰的斗争，应肯定其积极作用。决议认为，摆在乌克兰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或者被地主的波兰和君主的土耳其所并吞，或者转到俄罗斯的政权之下。……第二个前途终究是害处较小的。”^④这种“害处较小”的提法后来被认为过于消极，不再采用。一九五四年，苏共中央发表了《乌克兰与俄罗斯重新合并三百周年宣传提纲》，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极力予以抬高。《提纲》说：“乌克兰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同兄弟的俄罗斯人民永久联结在一起，就使自己摆脱了外国的奴役，保证了自己的民族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乌克兰与俄罗斯的重新合并大大有助于俄罗斯国家的巩固及其国际威望的提高。在反对共同的敌人——沙皇制、农奴主、资本家以及外国侵略者——的协力斗争中，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劳动人民的友谊增长并加强了。”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究应如何全面评价，我们姑且不论。单就《提纲》的立论来看，在上面短短的一段引文中，作者的自相矛盾已经暴露得十分清楚。如果说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合并大大有助于俄罗斯国家的巩固这一条确能成立的话，那么重新合并又有利于

两个民族的劳动人民进行反抗沙皇制度等共同敌人的斗争这样另外一条理由，如何同时也能够成立呢？当时的俄罗斯国家难道不是以沙皇为首的农奴主压迫农奴的工具吗？这样的国家机器加强了，怎么反而更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呢？反之，如果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加强了，沙皇俄国的巩固程度就一定会受到削弱。二者必居其一，脚踏两只船是不行的。再有，苏联史学家一再强调的沙皇俄国的兼并一律促进了被兼并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这一点，也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列宁对俄国的民族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俄国是以一个民族即以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国家。这个民族国家的特点是：第一、‘异族人’（总计占全国人口多数，即百分之五十七）恰恰是住在边疆地区；第二、这些异族人所受的压迫比他们在各邻国并且不仅是在欧洲各国所受的要厉害得多；第三、这些居住在边疆地区的被压迫民族往往有一些同族人住在国界那边，他们就有较多的民族独立（只要提一下住在俄国西部和南部边界以外的芬兰人、瑞典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就够了）；第四、‘异族’边疆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和一般文化水平，往往高于国家的中部地区。”^⑤列宁还明确指出，乌克兰是“俄国沙皇和资本家的占领地。”^⑥信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苏联历史学家全违背了列宁的这些指示。他们根据一种错误的民族政策的需要来歪曲过去的历史，沙皇俄国这个“各族人民的监狱”^⑦竟美化为他们共享幸福的天堂。这类文章既然没有科学性，那么无论其作者如何装点以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也是不可能有半点“革命性”的。